

邓小平赠外宾“新中国第一股”

1986年11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当邓小平将一张面额为人民币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赠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后,俗称“小飞乐”的“新中国第一股”让世界为之轰动。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1984年11月18日开业,为了解决企业发展急需资金的问题,该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证券部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10000股,每股50元,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



借改革东风探路“股份制”

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城市改革的浪潮已经开始涌动。

1984年,44岁的秦其斌被任命为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有知识懂技术又有管理经验,他不甘于仅仅为仪表系统的产品做配套,开始带领电声总厂开拓经营。当时,“音乐茶座”十分红火,他就大胆设想,提出本厂生产的扬声器除了给电视机做配套,还可以做成音响。

企业要发展,资金是关键。在这之前,秦其斌曾经参加过上海市长宁区工商联的一次集会,也结识了一些

老工商业主,老工商业者集资入股办企业的事启发了他。情急之下,秦其斌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即:企业拿出一元钱,再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一元钱,这样,既解决资金问题,又能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可谓一举两得的好事。

然而,毕竟是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年代,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无形阻力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说,搞股份制?这不是要培养一批“食利阶层”吗?这不是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吗?

“豆腐块”激起千层浪

当“小飞乐”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时候,新闻界适时地助阵推了一把。《新民晚报》就此发了一篇仅百余字的“豆腐块”通讯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豆腐块”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不久,《新民晚报》的领导打电话给秦其斌:“老秦,报社天天电话不断,都是询问‘小飞乐’什么时候发行股票,怎么发行,怎么认购?为了报社信誉,你们无论如何要向社会公众发一点。”

相比之下,厂里职工对出资认购股份却有种种顾虑和质疑,这也迫使秦其斌更倾向于向社会公开发售。“小飞乐”最终把目光和希望投向了社会公众:50元一股,发行1万股。

1984年11月14日,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由上海飞乐电声总厂、飞乐电声三分厂、上海电子元件工业公司、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公司静安分部发起设立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股金,其中35%由法人认购,65%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售。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股票是什么样子,负责承销小飞乐股票的上海工行信托静安营业部负责人黄贵鲜,找来了新中国成立前南阳烟草公司的老股票作参照,请人设计出股票样张。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海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这次发行的股票,没有期限限制,不能退股,可以流通转让,可以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人们亲切地称其为“小飞乐”。

发行股票的那天,许许多多的热心人早早来排队购买股票,队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人头攒动,人心沸腾,盛况空前。

邓小平赠送外宾“小飞乐”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率领的美国证券代表团。凡尔霖给邓小平带来了两件特殊的礼物——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和一枚可以自由通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

邓小平不仅高兴地收下了他的礼品,而且还将一张面额为人民币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张股票回赠给凡尔霖。这张“小飞乐”股票成为第一张被外国人拥有的股票,凡尔霖先生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第一位外国股东。

第一次分红引发争论

“小飞乐”召开成立大会之前,必须走一道必不可少的关键程序——去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孰料,又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工商局工作人员用疑惑的口气问道:“你们是什么所有制的?”

秦其斌回答说:“我们是股份制的。”

工商局工作人员说:“股份制?所有制中没有股份制!”

当时工商部门登记的表格上只有三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

秦其斌想,我们肯定不是国营的,也不是私营的,那就登记“集体”的吧。最后,他拿起笔来选择了“集体”这一隶属关系,解决了这一尴尬难题。但谁也没想到的是,集体所有制后来引发了“小飞乐”第一次分红是否为私分国有财产的争论。

1986年初,“小飞乐”第一次分红。经股东大会一致同意,每股分红35元,而后,股东自己出15元,配售一股,分红和扩股结合起来操作。

刚刚完成了分红扩股,税务局稽查大队来查账审核,稽查大队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

秦其斌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国营的。”

“集体的也是国家的!”稽查大队认为公积金公益金是不能私分到个人的。于是,秦其斌只好写检讨罚款。

无论如何,秦其斌还是让小飞乐按照股份制的形态运作起来了,其历史性的价值不言而喻。

这一非凡举止,即刻引起了国内外新闻舆论的极大兴趣。《朝日新闻》发表整版评论,声称中国企业将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国经济终将走向市场化。其实,邓小平赠送的不过是一张面值50元人民币的股票,然而,对于凡尔霖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于是,他当即改变行程,直奔上海西康路101号,找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黄贵鲜,亲自办理了股票转让手续。

在浩浩荡荡的中国“股海”中,“小飞乐”也许只是毫不起眼的一叶扁舟,然而,作为“新中国第一股”,它将永远记载在中国金融、经济发展的史册上。据《科技日报》

彭德怀支持慕生忠修公路

1951年,中央派遣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那时,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从数千里外驮运物资进藏,1斤面粉的代价相当于1斤银子,粮食、补给问题成了解放军能否在西藏站住脚的关键问题。时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的慕生忠先后两次率部运送物资进藏。由于沿途气候恶劣,平均每行1公里,就要消耗掉12只骆驼。面对艰难的行路状况,慕生忠萌生了修一条从青海进藏公路的想法。

1953年,在他进京申请修路时,国家正在修建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根本没有修建青藏公路的计划。慕生忠不仅熟悉青海入藏的环境,还特意实地考察过康藏公路。他认为,康藏公路沿线山大谷深,地质条件差,容易遭受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侵袭。冬天大雪封山期间无法通行,即使修成了,公路保养也很困难。相比之下,在青藏线修路,表面上看是位于高寒、高海拔的生命禁区,但是地势平缓,终年干燥少雨,公路的修筑和养护都比康藏线有利得多。

慕生忠从实地调查中得出的结论,赢得了老领导彭德怀的支持,他指示慕生忠,修一条自甘肃北部经过柴达木盆地和西藏拉萨直抵印度边境的公路,并指出“要以战略眼光完成任务”。

在格尔木修建“万丈盐桥”

为完成彭德怀的嘱托,在自己带队修建青藏公路的同时,慕生忠让部下齐天然带人修筑从敦煌到格尔木的公路。

齐天然他们从敦煌出发,把路修到了中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边上。当地牧民们告诉他们,自古以来就没听说有人能从盐



“慕生忠之墓”刻在铁锹把上

湖上走过去。但齐天然为了完成在慕生忠面前立下的军令状,竭尽全力往前修路。他带领筑路队伍一边在厚厚的盐盖上修整道路,一边把挖出来的盐水浇到平整好的路面上,等盐水干了就试着把车开过去。就这样,他们在盐湖上开出了一条平整坚硬、长30多公里的路面,人称“万丈盐桥”。

后来,有技术人员质疑盐桥算不上公路,不能长久利用,理由是教科书上规定,修筑公路时土的含盐量超过7%就要考虑改线。慕生忠听后不以为然,对他们说:“你说7%不行,那17%行不行?70%行不行呢?100%行不行呢?你都没有试过,怎么就能断定说这盐桥不算路呢?量多了可以引起质变,盐不够的地方拿盐来解决。科学不是静止的,科学是在不断前进的啊。”

事实证明,慕生忠和齐天然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格尔木还在盐湖上修了飞机场,如今,青藏铁路上的列车也是呼啸着从察尔汗盐湖上驶过的。

随身带着“慕生忠之墓”

在修路的过程中,慕生忠总是身先士卒,站在最困难的地方。他在自己铁锹的木把上刻了“慕生忠之墓”5个字。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

在修建格尔木附近青藏公路上的天涯桥时,河水奔腾咆哮,桥面离水面仅有30米。桥建好了,工程师邓郁清跳上第一辆汽车要试通车。慕生忠一把将他拉下来,自己坐了上去:“像我这种土八路出身的政委,今日死了,今日就有人来接替。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万一有个闪失,再没有第二个了。”当满载着面粉的大卡车缓缓通过天涯桥后,工人们把锅碗瓢盆敲得震天响,慕生忠、邓郁清和司机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青藏公路修到沱沱河时,河里的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了。慕生忠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冰冷的雪水中捞石头抢修路面。大家一个劲地劝他上岸,不用亲自下水。但慕生忠始终站在河最深、水最急的地方带领工人们一起抢修。不用命令,不用动员,人们纷纷跳进水中,霎时形成了一面人墙。10个小时过去了,等路修好了,慕生忠的双脚已肿得穿不上鞋子。大家心疼地说:“今天让政委受苦了。”慕生忠笑着说:“我受点苦,可是价值大。今天200人干了500人的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